

“菜根香”一语,初识它是在明代作家洪应明所著的《菜根谭》里,其中说道:“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这显然是一句励志箴言,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教化作用。关于《菜根谭》,还有一段逸闻,似乎更有些传奇的意味。《菜根谭》录就成书后,却不幸落得“残经败纸”、湮没无闻的命运,甚至,“著是书者为洪应明,究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只是到了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二日,遂初堂主人在“过古刹”时,于“残经败纸中拾得《菜根谭》一录”,之后它才渐渐被世人所识。我觉得,“菜根谭”就像“菜根香”这种家常美味一样,它的美也有一个被发现的过程。

读圣印法师的《菜根谭的智慧》,最喜欢他对“菜根谭”寓意的解释:“书名为何叫《菜根谭》?宋儒汪民曾说:‘得常咬菜根,即做百事成。’胡康侯听了这话,击节叹赏。菜根者,即青菜的根,如萝卜、番薯、芋头等粗食……洪先生取斯语以为书名,其寓意是在淡淡无味的菜根中有着无穷意味存在,故本书是修身处世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鹤林玉露》一书中说:‘士大夫不可一日离菜根,百姓不可一日无菜色。’这是当时贴在寺庙的门框上,教人去咬菜根的警语,其意义是老百姓如无菜可吃,徒嗅菜根以疗饥渴,那么就是政治家的不是了。故看一般老百姓的面色,即知当时执政者的成绩如何。”

记得有句佛门梵语与此意义相近:“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更把“菜根香”对修身养性、培养品德的意义、作用,阐释得透彻、通达。的确,面对滚滚红尘,只有拥有了那种咬得菜根香的心力和毅力,才能永远怀有一份平和的心境。还有人们常说的“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平民化生活理想的写照:安贫乐道,不慕荣华富贵,以追求精神生活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在某种意义上,“菜根香”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道德文化隐喻。已故散文家孙犁这样总结:“古人常用嚼菜根,教育后代,以为菜根不只是根本,而且也是一种学问。甜味中略带一种清苦味,其妙无穷,可以著作一本‘味根录’。其作用,有些近似忆苦思甜,但又不完全一样。”“菜根香”,能够让人悟出人生哲学的大境界,也是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一种体现。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菜根香”之所以成为一个喻义丰富的饮食文化符号,还在于其在传统饮食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其与文人名士的关系。

相比于普通百姓,文人墨客喜欢菜根香的程度似乎更甚。郑板桥曾煮菜根吃,有诗为证:“汲来江水烹新茗,买尽青山当画纸。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清代怪杰魏之洞,既做过两江总督,又曾以一本《书日答问》蜚声学术界。他曾在自家后院辟一菜园,又造茅亭一座,茅亭旁自题对联一副:“豫榘艰难君子教,菜根风味老夫知。”身为朝廷重臣,却能从寻常小菜、菜根之中体味人生艰难,由无味至神味,实属不易。

周作人在《饮食美文(咬菜根)》中说:“……这些菜的根是大可以吃得,尤其腌了久藏不坏,它的用处实在很大。萝卜的腌制品我是百吃不厌,这自然有条件,要我的牙齿还好的时候。南京于萝卜头之外有萝卜干,我尤其喜欢,虽然前清时在学校里咬了五六年,可是感情还不恶。后来得见福州的黄土萝卜,于是极好,只可惜远在南华不可常得。”孙犁对故乡的“甜疙瘩”始终难以忘怀——甜疙瘩是油菜的根,黄白色,比手指粗一些,肉质松软,切断放在粥里煮,有甜味,也有些许苦味,北方农民多喜食之。而蔓菁的根也是一种“甜疙瘩”,可用来做粮食,这是居住在北方的人们共同的饮食经验。擅写饮食美文的汪曾祺,其故乡的“菜根香”最让他钟情:“拌荠菜总是受欢迎的,作个新鲜,凡野菜,都有一种园种的蔬菜所缺少的清香。”作家邓云乡《云乡话食》中,有篇文章就叫《京华菜根谈》……

文人墨客为什么如此钟爱“菜根香”?有专家这样分析:“浓缩于格言谚语之中的味觉经验,不仅仅是对一种日常食物的肯定,而且是将一种生活方式建构为‘社会心理空间’,个人的生命记忆只有纳入这一空间中才能获得意义,得到解释。在另一意义上,尤其是对异常之味的嗜好,当然最能凸显对某种文化价值的坚持。”“菜根香”成了一种饮食艺术,具有了丰厚的文化意蕴。他们由咬菜根的味蕾感觉,进入到人生体会的大境界。

《菜根谭》云:“浓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菜根,往往被人看作为无味之物,甚至有人认为“夫菜根,弃物也”。然而,人生的艺术家、生活的智者却感悟出“菜根之香,非性定者莫喻”,在精神的安适、灵魂的安然中体味出菜根的“真味”,所谓“唯静心沉玩者,乃能得旨”。

“咬得菜根香”,颇接近于这种饮食境界。我们从粗茶淡饭菜根当中品味出美来,品味出饮食的安静、人生的安定,从而提炼出人生的恬淡和幸福。这是怎样的人生智慧!老子的饮食之道是“味无味”。什么是味无味?就是从没有味道的饮食当中体味出它的有味和美味。老子的“味无味”,是对“菜根香”最本真、最完美的阐释。

三 副刊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对公正和道义这一理想的追求,而公正和道义的实现,则需要法治的支撑和护佑。明清时代,社会动荡,各类矛盾错综复杂,法治连影子都不见,妄论公平道义的实现,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理想的追寻。当时,在艺术上趋向完美的昆曲,由于大量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参与,剧本和演唱触及民族的深层心理,受到广泛的追捧。既没有社会地位,又失去话语权的普通百姓,借助于虚拟世界,寄托自己的道义观念和集体情感,这一切又反过来推动了昆曲的繁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戏剧作品中,厉鬼、疯僧、神明之类往往成为昭示正义的人物,艺术与现实的辩证法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

且以钟馗为例。冷寂幽深的夜晚,一个狰狞丑鬼,由一大群小鬼陪伴,要把年轻貌美的妹妹嫁出去。舞台上自是一派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场面。丑和鬼,阴冷和热闹,鬼域与人世,匪夷所思的艺术构思和生活常识,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让观众在惊叹的同时,也为厉鬼钟馗的温情而感动。

钟馗本是终南山进士,满腹经纶。他得到了同乡好友杜平的帮助,进京赴试,得中状元。可惜由于生来相貌极其丑陋,被皇帝免去状元功名——看来,以貌取人的不公平古已有之。钟馗一怒之下撞死在朝堂之上,善良的杜平将钟馗的尸首隆重安葬。钟馗死后,在阴间做了鬼王。为报答杜平生前的恩情,他趁着除夕夜回到家里,准备将妹妹嫁与杜平。

昆曲舞台上的钟馗是大花脸,扛肩撇臀,整个身体都是扭曲的。恰恰是狰狞而险恶的相貌,衬托出他内心无比的温良和敦厚。即使做了鬼,钟馗仍然牵挂着人间的亲妹妹。兄妹早孤,如今丢下妹妹独自为生,实在是放心不下。既然父母亲都已不在人世,做兄长的应该为妹妹做这个主。钟馗相信,善良的杜平一定会照顾好妹妹的,何况赶考路上他们早有约定。

钟馗找到自己家门,叫妹妹来开门。妹妹突然听到哥哥的声音,顿时感到无比欣喜。人鬼相见,丝毫不见一点惊恐,只有浓浓的亲情。钟馗让她穿上凤冠霞帔,准备出嫁,又告诉杜平自己要把妹妹嫁过去。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他又率领小鬼们快快乐乐地离开。很快,舞台上披红挂彩,且歌且舞,一片欢腾……

鬼神之中,相貌最为狰狞的就是钟馗了。然而,恰恰由于是正义、公平、善良的隐喻和昭示,民间百姓反而对他愈加敬畏爱戴。

三 书评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处罚视角

——趣读水浒之八

晓晓鹏

对醉酒之人进行惩罚所用成本较低,只需约束其一人;对醉酒之人不予惩罚所用成本较高,须约束除醉酒者之外的所有人。因此,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而言,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此与传统法律方法判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醉酒通常会减弱辨别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是否醉酒是可以控制的,醉酒人自愿陷于醉酒状态,从而导致自己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对此具有过错。鲁智深的故事即是如此,即鲁智深皈依佛门,受戒出家,智真和尚也曾明白告知佛家的清规戒律,但鲁智深不守佛门清规,吃肉喝酒,酒后恣意生事,当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其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通过法律经济学的分析亦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法律经济学是一门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以1960年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提出的科斯定理为标志,并经阿尔奇安、卡拉布雷西等的发展,再经波斯纳等的理论阐释和司法实践,法律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且极具影响力的学科。法律经济学以效率、效用、机会成本等作为基本的概念,以成本-收益分析、财富最

己的追求。情爱是人的本性。想爱,就爱得炽热大胆;想恨,就恨得不共戴天。李慧娘苦苦央求,不要怪罪于姬妾们。谁知贾似道已经把那个玉琢般的美人用宝剑刺死,此刻还想让她拿剑刺下自己的头来。当贾似道终于明



据《红梅记》改编的秦腔《续红梅缘》



河北梆子戏《钟馗》



《九莲灯·火判》

白跟自己做对的是李慧娘的魂灵时,顿时十分惊慌,忙叫院子拿锄锹来,在牡丹花下寻找。发现埋葬在那儿的李慧娘,居然面色如生,衣衫不毁,这才恍然大悟,她的阴魂根本就没有散去。

《东窗事犯》刻画的是一个痴僧形象,借以昭示惩罚、复仇的正义力量。秦桧与妻王氏合谋害死了岳飞后,心里十分惶惶,来到灵隐寺斋醮忏悔。发现痴僧留下了一首题壁诗:“缚虎容易纵虎难,无言终日倚阑干;男儿两眼凄惶泪,流入襟怀透胆寒。”于是招来痴僧。痴僧其实是地藏王的化身,他说破了秦桧夫妇在东窗设计谋害岳飞的罪,并以笤帚扫之,秦桧惊叹“痴僧一席话,使我魂魄飞”,败下阵来,狼狈逃去。

《扫秦》一折,痴僧的性格塑造得非常鲜明。一见面,他就与秦桧针锋相对。痴僧,在这里是民心向背的象征。秦桧虽然权倾一时、陷害忠良、肆意所为,但他终究作恶多端,留下了“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千年之叹。民间传说中,油炸桧(油条)就是人们用面粉捏成秦桧的形象,放油锅中煎炸,演变而成的。在舞台上借助于痴僧的形象,讽刺、鞭挞奸臣,无疑更具有艺术感染力,也就更能顺应公道人心。

折子中有一段痴僧与秦桧酣畅淋漓的对白,痴僧的话,恰似一支锋利的剑,直刺秦桧。冷静地说,痴僧虽是地藏王化身,并非法力无边,也没能诛杀秦桧,只是用“笤帚扫之”而已。但是他敢于揭露秦桧夫妇东窗策划陷害岳飞的阴谋,让秦桧心惊肉跳,不能不承认,“被这痴僧一番言语,说得毛骨悚然”。这无疑告诉人们,哪怕秦桧树大根深,又与宋高宗沆瀣一气,人间或许奈何不了他,但他最终免不了有一死,到了阴间地府,仍然会有牛头马面在惨雾悲云中拷问他。正如痴僧所唱:“到如今悔后迟,他在阴司下便等你,在阎王殿前去告你。”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种朴素的民间理想终究要靠现代法治来实现。

在《扫秦》之后,《东窗事犯》描写的秦桧,终于落得了应有的下场。“恰道罢罢太师铁锁沉枷在身,并无那玉女金童接引,则一簇牛头鬼吏跟。教秦桧在阴曹地府受到的惩罚,是他在阳间作恶多端的必然结果。

痴僧,蓬头垢面,浑身污秽,左手拿着一把扫帚,右手执一支吹火筒,他的形象确实丑陋。然而,他的“痴”,却是修炼到了极致,一派无所拘牵、无所不为的状态。他不仅无所顾忌地表达了对英雄岳飞壮志难酬的无限同情,对奸臣秦桧的无比仇

恨,更告诉观众生而为人道理,从而起到警世的作用。这样的形象,便不再腌臢,而是正气凛然,令每一个观者敬重、赞叹。

3.

再看《九莲灯·火判》。剧本讲的也是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借助于神明,作正义昭示。由净角扮演的火神——火德星君,既要唱,又要演,更要有嘴里喷火的绝技,戏份很重,格外受到观众的喜爱。

闵远的父亲是忠臣,由于遭奸人迫害,全家人不幸都被关进狱中,唯有他得以逃脱。这个充满智慧的孩子,求得圣母的九莲灯,才实现愿望救出家人。《火判》这一折,说的就是忠臣之子闵远在义仆富奴的陪伴下,刚刚逃出京城,又累又饿,在火神庙里歇息。他的一番哭诉,不经意间惊动了火神,火神指点富奴,让他去求圣母要九莲灯的故事。

火神一上台有两段唱,很鲜明地表现出了他嫉恶如仇、主持正义的火辣辣的性格。得知闵远父亲闵远登的冤情后,他十分气愤。于是三步三拜,踏上椅子,登上桌子,再登桌上的椅子,然后双脱脚,凭空坠下,坐到椅子前的桌上,再用双股和腰部向上耸,坠落到桌前的椅上坐好。在坠落时,他还用手和腰以上的部位做配合的动作,身段自然优美,髯口和服饰丝毫不显零乱。

净,恰恰是不净。昆曲家门行当中历来有“七红、八黑、三和尚”的说法。七红,就是指七个红脸人物,包括《风云会》中的关羽、《八义记》中的屠岸贾、《慈悲愿》中的回回、《双红记》中的昆仑奴、《一钟情》中的弼马温、《九莲灯》中的火德星君也在其中(见周传瑛《昆剧家门谈》)。“三年稳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大面”。这是人们对昆曲净角的高度评价。最初“参军”一角的扮相是粉白黛绿,元代以后演变为“净”,俗称大花脸,脸上画脸谱,涂满颜色,而且尽可能地使脸膛画得大大的。红色的脸谱(如钟馗),一般显示角色的忠义耿直、刚正不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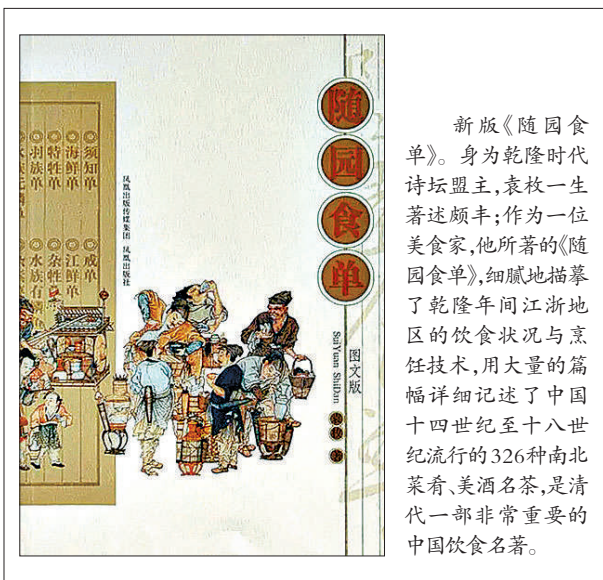
戏中,火德星君告诉富奴:“莲花山,香果洞,道德真人驾前,有此九盏莲灯,上能照彻天门,下能照开地窟,有解难度厄之妙。若能求得一盏莲灯,你主人就有救了。”富奴回答:“只要有路可通,我何惜一死。”火德星君给他指出了前往莲花山求取九莲灯的路径:“从泰州府西去,一百里之外,即入此界矣。”顷刻间,富奴从一场梦境中苏醒过来。但,“神明梦语记坚牢”。他终于明白,只有这一条道路能够救主人,决心已定,生死置之度外,便与闵远告别,也与神明告别。接下来的路,他要自己走……

正义者,自有神明相助。这样的构思,雅俗共赏,在剧场颇能博得观众的喝彩,至少人们能由此得到一份心理慰藉。正义的理想由戏剧照进现实,推动了人们观念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除醉酒者之外的所有人。因此,从法律经济学角度而言,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此与传统法律方法判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当然,这不是说通过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行为承担责任一定就是最有效率的。比如对于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法律豁免其责任,而是由其监护人来承担责任,何以如此?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在民事法律上称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完全无法辨认自己的行为,因此对其惩罚并不会导致其认识到该行为的错误性,亦当然不会达到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侵权事件的效果。由于监护人承担相应责任,则势必会督促其监护人善尽监护职责,加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管,从而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侵权事件。

法律经济学将经济学作为研究法律的工具,主张效率导向,但法律并不仅仅是效率的体现,还有公平的价值考量。因此,效率并不是法律唯一的追求,虽然很多时候,符合效率的,也是符合正义的。不过,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法律自身固有的价值,并不是能够被经济学所完全代替的。古希腊正义广场上的正义女神雕像底座上镌刻的那句名言是: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所以,法律经济学只是丰富了法律人的工具箱,但不能完全代替法律。



新版《随园食单》。身为乾隆时代诗坛盟主,袁枚一生著述颇丰;作为一位美食家,他所著的《随园食单》,细腻地描绘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用大量的篇幅详细记述了中国十四世纪至十八世纪流行的326种南北菜肴、美酒名茶,是清代一部非常重要的中国饮食名著。